

钟敬文^①

访问者：金 穗

地点：北京友谊医院病房

时间：1995年7月13日



金：钟老，今天您在医院里休养，打扰您了。您在20年代曾访问鲁迅，30年代在浙江大学任教，然后去日本进修。很希望您能够给年轻人讲一讲，您在日本进修的情况。

钟：我在去日本之前，在1924至1925年间，给北京大学《歌谣》周刊投稿，并在家乡收集民间故事。1926年到岭南大学，次年转到中山大学，在那里除当助教兼

①钟敬文，1903年生，广东海丰人。早年以散文诗歌闻名，著有：《荔枝小品》、《西湖漫拾》等。后从事民俗学研究，历任中山大学教授、浙江大学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中国民俗学会主席。1934年春赴日本客座研究，1936年7月回国。

教学之外，又同顾颉刚、董作宾等人合搞一个“民俗学会”，它是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一部分。1927年我访问过鲁迅先生，出版了《鲁迅在广东》。1927年冬天，我们出版《民间文艺》杂志，但同编的董作宾很早就去河南搞考古了，我就一人独编。1928年春扩大成《民俗》周刊，前24期全是由我编辑。同时还搞丛书，搞民俗学讲习班和民间文物陈列所等工作。我对民俗学兴趣很高，刊物的约稿、编稿，乃至送印刷厂，都由我去办理，因此我与民俗学结下很深的缘分。我最初接触日文，是在岭南大学的时候，那时我认识一个台湾学生，叫张秀哲（他后来是革命志士），他教我同杨成志的日文，我们也帮他用中文翻译一些东西。后来中大教授何思敬，笔名何畏，我经常约他写一些文章。他是东京帝大毕业的，对民俗学有些研究，曾借日本民俗学的书给我看，我也顺便了解了留日的情况。

1928年我到杭州，在浙江大学等校任教，与当地姜子匡、钱南扬等人合编过民俗刊物。1930年我们成立一个“中国民俗学会”。我是非常热心这项事业的。到1933年，我写了几篇关于民俗学的论文，开始同日本学者通讯往来。先是同日本的松村武雄教授通讯，后来又同美国的艾伯哈德^①博士通讯。我们出的刊物《民间》等上面，也发表了他们的文章。此外，我也给日本民俗学刊物寄过稿去，发表了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》，这是关于亚洲民间故事类型较早的文章。我当时想，要搞中国学问，中国学者应该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把中国民俗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。从我当时知识的结构来看，还不能够担起此种重任，必须有一段时期学习。因此，在1934年春天，我

^① 艾伯哈德（W·Eberhard）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，著有：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》、《中国民俗研究及其他》、《中国历史》、《中国文化象征词典》等。

同我妻子陈秋帆^①一起去日本。去之前，我们在浙大，跟一位教日语的漆老师也学过点日语。

我年轻时候，家乡（海丰）有一批乡亲去法国留学。我因为家里没有钱，出国也只是一种梦想。这次去日本进修，也没有国家资助，只是不需要领取护照。去之前，我们到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去交涉，是同浙大同事周学普一起去的。他原是京都大学德语科毕业的，当时在翻译《浮士德》，我也帮助他修饰过部分文字。我那时是浙江大学专任讲师，在领事馆里一讲，他们就给开了介绍信。我们在4月初从上海乘船去到长崎。海关看了领事的信，也就没有过细检查行李。

到东京，我们先到日华学会住了几天，然后搬到神田的一个赁间。我们去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，是松本龟次郎先生的学生在教课。有个老师教学很有办法，我受益很多，可惜他的姓名已经忘记了。4、5、6月我们都在学日语。同学有一位有名的电影艺术家王莹，她原是复旦大学的学生，后来做演员；同学习的似乎还有北伐时写《从军日记》的女作家谢冰莹。我们每天早上去上课。到东京不久，我就到早稻田大学的大学院去找西村真次^②教授。他后来是我的导师。他研究人类学，也研究神话学，写有好几本书。他的《人类学泛论》，在我出国前就由张我军翻译成中文出版。我在出国前，曾经写过一篇论文《天鹅处女型故事》。天鹅处女故事是全世界广泛流传的有名故

① 陈秋帆（1909—1984），广西省柳州人。中国作家。1934至1937年在日本留学，进法政大学日本文学系。回国在中山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任教。译有《拜伦传》，有《陈秋帆文集》。

② 西村真次（1879—1943），人类学家。1918年起在早稻田大学任教。其代表作有：《人类学泛论》（1929年）、《人类协同史》（1930年）、《日本古代经济·交换篇》（1933—1939年）等。

事。西村先生在我出国之前写过这个题目的论文，他举出了几十个同类型的故事，文章在《早稻田文学》上发表，其中关于中国的，只有一个例子，还是在内蒙古地区的。我看到之后，根据中国古今许多同型的资料，写成论文。这时我带给西村先生看，他看了认为很不错，就允许我做他的研究生，在早稻田大学大学院。当时日本学生入学，填写入学书，要用毛笔写在美浓纸上的。学费一年是40元，实际上钱是归老师的，跟中国现在通行的制度不一样。

稍后，我们就搬了家，为的是靠近早稻田大学，在高田马场，是一间公寓，叫双树庄。后来又另搬了一间，有6席大小，我和秋帆自己做饭吃。我每天早上去早大图书馆，研究室就在图书馆的二楼，进馆时把学生证放在入门处，自己就进去随便看书。图书馆有9层楼，各层全是书，我都去看过。早上8点钟进去，12点钟出来。中饭就在校门口外的一家中华料理店解决。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哪里吃饭，用两毛钱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定食，有一碗饭，一份菜是用猪内脏做的，一碗酱汤。我是喜欢喝这种酱汤的。不过，我经常只是吃一碗“荞麦面”，加点酱油。为什么我要吃它呢？因为便宜。一毛钱一碗。省下点钱，在旧书店里能够多买一本旧书，所以我基本上是吃这种面。我有时也约好到老师那里去谈谈，平时就只是在图书馆中看书。

金：请您回忆一下您的日本朋友。

钟：当时实藤惠秀^①是在早大高等学校任教授，我们去了不久就认识了。因为在1934年冬天，日本开一个“作家慰灵

^① 实藤惠秀，(1896—1985)，博士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略》、《近代日中文化交涉史话》、《日中非友好的历史》，译有：《日本杂事诗》(黄遵宪原著)、《虾球物语》(黄谷柳原著)、《四世同堂》(老舍原著)等。

祭”，祭 500 位作家，其中有苏曼殊^①。慰灵祭有展览会，记得是在三越百货公司楼上开的，会场上有各种纪念品及有关条幅。我是对苏曼殊有兴趣的，这时就写了两首汉诗，用宣纸写了并裱起来，送去展览会展出来。实藤先生看到了，知道有我这个人，就到日华学会去打听到我的住地。有一天他到双树庄找我。他能讲中国话，就是慢一点。他问了关于苏曼殊事情的话，我们从此认识，并渐渐要好了。1935 年春天，他还请我到他那儿的公园去赏樱花，谈论中国文学。多年来我同实藤不断通讯，互换书籍，一直到他去世。他是我在日本亲密朋友中的一个。我们当时还谈到对日本的想法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对日本的想法，比日本人还要了解深刻。”他这人头脑很清楚，没有民族偏见。抗战中不少日本学者到中国来过，买了很多中国图书资料。战后他就倡议：“归还中国文化财！就是战争中买的也是掠夺。”所以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。比如他翻译了黄尊三的《留日日记》，原书是他在战中来中国买的。这时他就把原书归还了中国。等到他的译书要出版时候，没有了底本校对，他来信要我帮他核对一些词句，我在北师大图书馆借到该书给照办了。

另外还有松村武雄先生。我在日本最初发表的文章，就是通过他接洽的。我初到日本拜访他时，穿了皮鞋，进出门穿脱很慢，先生跪在席上迎送，我觉得很抱歉。以后我去人家里拜访，总是先把鞋带松开。松村先生编有《世界神话传说集》，我在中国时候就寄钱请他陆续代买，后来他写了本书：《一个神话

^① 苏曼殊（1884—1918），文学家、僧人。原名戡，曼殊为其法号。广东香山人，出生于日本横滨，其父为旅日华商，母亲为日本人。1902 年在东京曾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青年会，1903 年又参加拒俄义勇队。1903 年回中国任教于苏州吴中中学。1907 年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。1913 年，发表“反袁（世凯）宣言”。他是南社成员，诗文俱佳，著有《苏曼殊全集》。

学者的手记》，书里面说到我，称我为“知友”，是相识的人的意思。他是当时日本最有权威的神话学者，现在则是大林太良先生了。至于柳田国男^①先生，他是当时日本民俗学的权威，他的代表作是《日本民间传承论》、《乡土生活研究法》等书。但我没有去拜访过他，原因一来他是研究一国民俗学的；二来我看了他的著作，觉得自己还没有请教他的资格。他著的《日本民间传承论》序言，我在日本时把它翻译了，发表在上海《艺风》杂志上。那儿的主编是友人孙伏熙。

还要讲到实藤惠秀和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的成员们。他们多是东京大学文学系毕业的，不满意东大研究中国文学传统偏于古典方面，而 they 要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，像郭沫若呀、鲁迅呀等等。我当时已经出版了几本散文集，在中国新文学界有一定的声名。1935年春天，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就请我去演讲。那似是在新宿一个咖啡厅里。来了有十几个人，实藤呀、增田涉^②呀、竹内好呀都到了。我讲的是“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”。当时他们的刊物上曾有报道，这件事是实藤先生热心从中介绍的结果。后来我在香港的时候，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出版了，有好评，我就寄一本给实藤先生，他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。

金：您在日本的中国朋友呢？

钟：我认识了早大的同学林林，头一次见面，记得是在早大附近的路上。他当时热衷于海涅的诗歌，谈的正是此事。乔

^① 柳田国男（1875—1962），日本民俗学的创建者。1947年为艺术院会员，1949年为学士院会员。其代表作有：《蜗牛考》（1930年）、《民间传承论》（1934年）、《日本の祭》（1942年）、《神道上民俗学》（1943年）等。有《定本柳田国男集》31卷，别卷1（1963—1971年）。

^② 增田涉（1903—1977），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。1931年游学上海，师事鲁迅。1934年，与竹内好、武田泰淳、松枝茂夫等组成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。后任大阪大学、关西大学教授。一生致力中日文化交流工作，翻译中国作品甚多。



中国学生修学旅行在奈良

冠华^①呢，他是1933年到东京的，在东大研究哲学吧。我在杭州时的一个学生邵鸿书，他是邵力子的侄子辈，这时他同乔冠华住在一个学旅，地址在东大红门附近。有一天，他们来看我，聊聊哲学什么的。我屋里挂着郁达夫^②用红色笺纸写的一首诗，是他集龚定庵的诗句赠我的，乔冠华看了一阵，似乎很感兴趣。不久，我见到邵鸿书，我问他：“老乔怎样了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乔

① 乔冠华（1913—1983），江苏盐城人。清华大学毕业，1933年赴日本留学，1935年被驱逐回国。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。

② 郁达夫（1896—1945），浙江富阳人。中国作家。1913年赴日本留学，192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。1921年，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成立“创造社”。曾参加一些杂志的主编工作。1936年曾赴日本讲学，反对日本侵华。郁达夫文如其人，充满浪漫伤感色彩。1945年9月17日在印尼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。著有《郁达夫文集》等。

冠华不知怎的，被日本警察抓去了，也搞不出什么来。拘留了两星期，就被驱逐出境了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抓他？”他说：“据说乔同朝鲜人的共济会有联系，那是共产党的外围，为了援救受难同志的”。后来，乔的回忆里也说，他当时在东京被抓的事情，我和林都知道。

金：您在日本的生活如何？

钟：陈秋帆是学习日本文学的，她直接考上东京法政大学。她的日文很好，近藤忠义主任教授是挺欣赏她的。每天一早，她就带一个布书包上学去。她经常穿一套日本的连衣裙。我们两人一个月约用40多块钱。也没有官费，稿费也很少。最后一年她才得到官费，生活才好一点，但我已经回国了。我是争取时间去学习，神田街是经常去的，街两边伸长一里多，房子也不高，我星期天常常从一头开始走，一家家图书看过去，那是很大的快乐。在那儿看的书也不算少，但后来带回国的只有两箱子，其它全处理了，后来等逃出杭州时完全散失了。我去逛上野公园是刚到日本时候，觉得它很广大。1935年冬天，学校照例为该年毕业生举办旅游，十几个同学，由一位老师带队，去京都、大阪、奈良、宫岛等地，我印象很深。京都很清静，古迹多，有中国遗风；最好的是奈良，整个地区像一个公园样子，游人用面饼喂鹿子，很有趣；宫岛也很美，红红绿绿，建筑与自然风景配合得很好。在日本也看过宝塚的歌舞伎一次。一块钱一张票，当时觉得很贵了，不记得是谁请我们看的。日本地震很普通，摇来摇去，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看完书出来，走在街上，看见电线杆子倒了不少。回寓问秋帆，才知道是地震了。后来秋帆讲给加藤千代^①教授听。她一直记得，我却早忘掉了。

^① 加藤千代，日本广岛大学教授，研究中国民俗学的专家，访问中国几十次。

在日本我发表过几篇文章，《槃瓠神话的考察》分三期连载在《同仁》月刊上，稍有些稿费。在《民俗学研究》上，我发表过《老獭志传说之发生地》，内容主要是补充日本学者松本广信教授在材料上的不足的。

我在日本曾经狼吞虎咽地读了一些书。这两年里，对于搞民俗学所需的知识结构，我得到些补充，像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、原始社会史等等一些知识，都有所涉猎。现在国内一些年轻学者的基础知识比较缺乏。上月我去北京大学参加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开学典礼，同费孝通^①先生谈起年轻学者。我说这几年，民俗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在中国的气势还不错。他说：“基础功夫不够。”我是同意他的说法的。我在日本两年多，总算对这几门学科粗略学习了一下，几十年做研究工作，它一直在起作用。没有它们是不行的。

金：您对日本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态度怎样看？

钟：研究中国学问方面，是京都学派^②比较好。过去东京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比较保守。实藤先生他们则不然。现在是比较平衡了。这应该归功于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的成员们，他们当时也是青年人，没有地位，后来他们也成为学者，也有权威了。他们也不同于中国学者，他们有他们的教养和眼光，只是比较接近中国学者，我同他们来往也多。

日本人大都很爱学习，一般社会上的人也是用功的。我讲

^① 费孝通，1910年生，江苏吴江人。中国社会学家。燕京大学毕业，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。曾任云南大学、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社会学所所长等。著有：《江村经济》、《生育制度》、《乡土中国》等。

^② 京都学派，日本近代研究东洋学包括中国学的学术流派。以京都大学为中心，以内藤虎次郎、狩野直喜、桑原隲藏为初始推动者。学术风气开放，考据严谨，有突出成果。

三件小事给你们听。在早大图书馆里有些工作的小学徒，他们一有空，都在读外语。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回答说，在准备考试。又有一次，周学普教授来信叫我在东京给他买一部书：《劳动与节奏》，德文本。该书是很有名的学术著作。我到各书店去找，都找不到。有一天在偏僻的小街上，我走进一个小小书店。一个中年人坐在柜台上，我一看那本书正在他背后书架上，我问他：“你那一本书要多少钱？”他抬头望望我，然后说：“这本书是我自己要看的。”你看，这是一本很专门的书，一般人是不会看的。我想，这么一个中年人，开个小书店，竟然要看如此专门的书。还有，我们离开东亚日语补习学校以后，为了加强日语能力，就请到一个日语老师，他是在电台做广播员的，一月挣30元。有一天，他请我们到他家去玩。我看见房间的一面墙边，摆有好几百个玩具，那是一条棍子上安个木人头的，叫做“鸣子木偶”，各种各样，新旧大小好几百个。我问他：“老师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在研究它。”我又问：“你发表过论文吗？”他说：“现在在日本研究的人不太多，但有一人是权威。我现在写文章不能够超过他。要等到能够胜过他时，我才发表文章。”你看看，厉害不厉害，和有名学者比赛，还要胜过他才行。从这三件小事情，可见日本学术文化空气，已经深深透入一般老百姓心中，大学者们就勿论了。日本战败后，很快能够恢复，主要就在教育、文化根基厚。比起来，我们就不够，薄弱多了。这一点使我感受很深，那不是简单的民族！日本人做学问，我们看着狭窄，但很深。我们现在大而无当的东西太多，空话连篇，没有意思。

我在1936年3月结束了学习，但在7月底才回来。那几个月，我在日本每天写点散记，关于日本风土人情什么的。积成一本稿子，后来带回到杭州。不幸第二年打仗，稿子在撤退时

丢失了。陈秋帆因为她的老师要她上研究院，第二年夏天才回来。我回到杭州又从事教育工作。抗战以后，我在香港时（解放战争时期），才同实藤惠秀恢复联系。到70年代后期，我为翻译增田涉的《鲁迅的印象》，也同增田通过信，商量文字问题。他也问我关于鲁迅的一些事情。到1981年，大林太良、伊藤清司、加藤千代他们来中国，我参加接待，此后彼此往来多起来了。

金：您对中日学术交流有什么希望？

钟：中日文化交流比过去多，是好事。中日学术有异同，他们的钻研深一些，分工多一些，不满足于一般大面上的研究。

金：能否理解成中日学术竞赛？

钟：可以。假如正确对待，当然是好事，彼此都能够专业化地做学问。今天中国，个个成为万金油的做法是不成的。

现在中国在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上的调查任务还很重。收集整理是个重要任务，当然也要研究。中日之间无须强求一样。一般地说，我们的学术基础薄弱些，要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才行。搞学问仅有材料是不够的，如果方法和理论不足，发现不了问题，也论证不了问题。中国年轻人要加倍努力，主要是增加思维里的养料。

金：现在有一些年青人专靠西方的理论，没有理解和消化，就随便应用起来。

钟：要消化别人的理论。五四时期一些学者是颇能消化别人的理论的。问题不在于介绍什么，而在如何介绍！自己没有看懂，没有吃透，就下手去介绍给读者，那是危险的。